

佛



道

佛



寓言鑒賞辭典

● 邹智贤 / 主编



儒道佛寓言鉴赏辞典

邹智贤/主 编
薛学共 徐子宏/副主编

岳麓书社

责任编辑 鄢 琨
封面设计 戴树铮

儒道佛寓言鉴赏辞典

邹智贤 主编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长沙市银盆南路 67 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1994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字数:950,000 印张:32 印数:1—4,000

ISBN7—80520—516—7
H·15 定价:27.80 元

湘新登字 007 号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调换

导 言

邹智贤

(一)

若将我国传统文化视作一个完整系统，儒、道、佛三家便无疑是其最基本的元素。所谓儒家，指的是以孔子为创始人的学术派别，道家则指以老子思想为宗脉的学术派别。在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战国时代，儒家和道家都是作为别为一宗的学术派别而出现的。不过，无论就其思想体系的博达来说，还是就其现实影响的深广而言，儒、道两家在当时都可谓“显学”。在先秦六大家——儒、道、墨、名、法、阴阳家中，若按其基本的致思趋向来区分，实际上只有儒、道两家。先秦各派思想的对立和交锋，主要是儒家思想与道家思想的对立和交锋。对此，古人早有认识：“道者玄化为本，儒者德教为宗。九流之中，二化为最。”故而台湾著名学者徐复观先生所著《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即是以儒、道两家的思想为骨干而展开的。

那么，儒家和道家各自的精神内涵是什么呢？《汉书·艺文志》在论及儒、道差异时曾追溯其渊源：“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道家学派“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司徒之官”着眼于现存秩序的图治，故而强化宗法等级，强调现实的一面；而“史官”却没有急功近利的压力，得以有开阔的胸襟和深邃的眼光审视当下人生，故具有超现实的品格。通过这种追根溯源的考察，我们不难窥见儒道两家各自的发展走向。儒家思

想的特质，一言以蔽之，即是“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对内进行身心道德的修养，以达到自我人格的完善；对外推行“仁政”，以达到理想的大同社会。此即所谓“内圣外王”之道，从正面担当了中国历史中的伦理、政治的责任。道家则不然。道家虽然也有入世、理政、治民思想和抱负，然而却是站在儒家的对立面采取“无为而治”的方略，“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况且，这种“无为”在某些特定条件下极易转化为超脱现实、随俗沉浮、玩世不恭、放浪形骸、伸张个性、否定一切，而这正是道家的另一种面目。因此，道家主要从负面充当了中国文化中的社会批判的角色。总之，儒家和道家孕育、发展于中华文化的母体，共同构成了民族文化的滔滔大河。

必须指出的是，道家与道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道家哲学是道教形成的重要思想渊源和理论基础。道教从其创立之时起，便奉老子为教祖，引《道德经》为教义，把具有形而上思辨意义的“道”演化成了生化万物的神灵。因此，从精神气质上说，道教与道家是一脉相承的。

汉魏以降，西域佛教涌入中土。佛教认为宇宙人生都不过是刹那生灭的现象，一切存在没有固定的本性，人生纯是苦难的聚集，只有爱欲绝灭，烦恼断除，到达清凉、寂静、自由自在的“彼岸世界”，才可得解脱，免受轮回之苦。显然，佛家的义理与儒、道的精神是不甚契合的。一种外来文化要想立足，就必须迎合本土原有的“定势”，而在佛家的义理中，恰恰也有着与儒、道相通的文化因子。例如，佛家提倡“普度众生”的善行，奉行“积极为人”的准则，就同儒家倡导的“仁义”、“忠恕”之道相去无几。佛家思想与道家理论的契合处就更多了：佛家空宗的“空无”理论与道家“玄之又玄”的思辨哲学相通，印度禅学重视直觉体验的认识方式与老庄追求对“道”的心灵领悟相合……佛教在进入中土之初，极力伸张了与儒、道相契合的一面，因而得以共存和发展，终于在中

原本土形成了儒、道、佛三家鼎足而立的格局。

诚然，这里所谓“鼎足而立”，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是一种“思维具体”，实际历史中的儒、道、佛三家在一定条件下互相影响、互相渗透，彼此吸收、融通变易，早已面目全非了。在中土生根的佛教已不是正宗的印度佛教，而是经过了蝉蜕、变形的中国佛教；先秦以后的儒家和道家也不是“纯儒”和“纯道”，而是吸收了别家思想、经过了加工改造的“儒”和“道”。例如西汉名儒董仲舒，把阴阳、五行和道、墨、名、法各家思想攝进儒家学说，用天人感应的观点和天人比附的手法，企图使封建的统治关系神圣化和永恒化，建立了充满浓厚宗教色彩的新儒学。又如东晋道士葛洪，他大量地援儒入道，用儒家的伦理纲常补充并改造道教，他的名作《抱朴子》，“其《内篇》言神仙方药，鬼怪变化，养生延年，攘邪却祸之事，属道家；其《外篇》言人间得失，世事臧否，属儒家。”（《抱朴子外篇·自叙》）先秦以后的学派更是揉合诸子思想、杂取百家理论的混合物。例如魏晋玄学，主要借《易》、《老》、《庄》来建构体系，故有“魏晋新道家”之称。同时，由于庄、禅在破对待、空物我、泯主客、齐死生、反认知、重解悟、亲自然、寻超脱等方面具有类同的精神气质，玄学与佛教也趋于合流，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禅宗。又如宋明理学，以程朱及陆王为代表的宋明理学曾被称为新儒家，但已非本来意义上的“儒”，实际上是儒、道、佛三教合一的产物。宋明理学在政治伦理层面上承继了先秦儒家的传统，在理论构架上则多受道、佛的侵染，道教的元气论和“先天图”影响了理学的宇宙生成论，佛教对世俗欲望所持的冷漠态度开了理学家“存天理、灭人欲”的先路。故而早已有人指出：“两宋诸儒，门庭经路，半出于佛老。”（全望祖《鲒埼亭集外编·真西山集》）更有人干脆称“外儒内佛老”。鲁迅先生曾指出过：“中国自南北朝以来，凡有文人士，道士和尚，大抵以‘无特操’为特色的。晋以来的名流，每一个人总有三种小玩意，一是《论语》和《孝经》，二是《老子》，三是《维摩诘经》，不但采作谈资，并且常

常做一点注脚。唐有三教辩论，后来变成大家打诨；所谓名儒，做几篇伽蓝碑文也不算什么大事。宋儒道貌岸然，而窃取禅师的语录。”（《鲁迅全集》第5卷第310页）

综上所述，在我国长达数千年的历史上，儒、道、佛三家思想构成了社会意识形态的核心，侵入到了个体无意识的深处。统治者兼容三家，交互为用；士大夫身在朝廷，心系佛老。正如中唐时名僧神清所言：“释宗以因果，老氏以虚无，仲尼以礼乐，沿浅以泊深，籍微而为著，各适当时之器，相资为美。”（钱易《南部新书》卷乙）总之，在同一时空的背景条件下和历史舞台上，三家的融通、调和成为了强劲的时代潮流。在这股潮流中，从整体上看，你找不到得孔、老真传的儒、道思想，分辨不出正宗的佛教义理，只存在三家合流的聚合态，而这恰恰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传统和传统文化。

（二）

大凡理论形态的东西总有几分生涩、乏味，令人生厌。故而儒家、道家和佛家在阐释、宣扬他们的学说、主张时，往往采取生动活泼的形式，运用各种文学体裁，溶情于理，寓庄于谐，从而使接受者进入痴迷的艺术境界，收到理想的宣传效果。寓言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样式，便是他们惯常运用的手段和工具。

什么叫寓言？寓言是一种通过具体故事折射普遍意义的边缘文体。从构成成份看，寓言有故事情节和比喻意义两个基本要素。寓言与比喻、影射、象征等艺术手法的区别，就在于它有比较完整的故事情节；寓言与一般故事的区别，则在于它具有比喻意义，如果一个故事能通过具体的情节借此喻彼，以小见大，见微知著，托古讽今，使人受到教益，得到启迪，便是寓言。从思维方式看，寓言是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的完美结合。一方面，它需要用形象思维来构筑故事情节，树立性格形象；另一方面，它又需要用逻辑思维来推导出其中所蕴含的意义，领会其言外之意，体味其韵外之旨。

在我国,儒家寓言散见于各类典籍和文章中,道家寓言则主要集中在《庄子》和《列子》两种典籍中。《庄子》一书,自称“寓言十九”,即寓言占了全书篇幅的十分之九。全书三十三篇,每篇都围绕一个中心内容,编造一系列寓言故事,从不同视角加以论证。在佛教典籍“经”、“律”、“论”三藏中,保存了大量寓言,尤其是“经”。佛典中的“经”,按佛教的传统说法,就是佛陀说法的记录,佛陀说法多用譬喻的方法,往往通过具体、形象的事例来使人领悟他的道理。《百喻经》、《贤愚经》、《杂宝藏经》、《六度集经》、《杂譬喻经》、《出曜经》等佛经,实际上都是故事文集,而这些故事有不少是优秀的寓言。

佛家常说:芥菜子里可容下万仞高山,微尘之中可显示大千世界。寓言虽形制短小,却有极丰富的思想蕴含,可以说,儒家、道家和佛家各种幽冥莫测的理论观点,都能通过寓言折射其神异的灵光。正由于此,就为我们从寓言的角度反思传统文化提供了可能。

(三)

儒、道、佛三家广泛运用寓言这种特殊文体,其宗旨大致是:

第一,阐释义理。在儒道佛三家中,说理寓言占了相当比重。例如,儒家以“月攘一鸡”(《孟子》)解析仁政德治,以“愚公之谷”(《说苑》)陈述重教化、省刑罚,以“景公出猎”(《晏子春秋》)阐明知人善任,以“王良与嬖奚”(《孟子》)提倡重义轻利;道家借“啮缺问道”、“轮扁斫轮”等寓言阐述唯恍唯惚、幽冥莫测的“道”,以“狙公赋茅”、“塞翁失马”等寓言表现等万物、齐是非的相对主义观点,用“螳螂捕蝉”、“林类百岁”等寓言说明超世离俗、远害全身的处世原则;佛家寓言“犍皮诱乳”(《僧伽罗刹所集经》)是阐释万有虚幻、四大皆空的佛理,“种果得果”(《大庄严论经》)是说明因缘和合、善恶果报的观念,“热釜求环”(《杂宝藏经》)是喻指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道理。总之,义理是

儒、道、佛寓言的灵魂，不蕴含义理便不成其为寓言了。

第二，宣扬教义。儒家和道家为了扩大自己的社会影响，有效地宣传自己的施政主张，往往诉诸寓言的形式。佛教创立后，为了征服人心，立足社会，也往往采取各种文学形式宣扬教义。据传，释迦牟尼本人的文学造诣很深，他宣扬佛法总是通过具体的形象、生动的譬喻来吸引和打动听众，使之“弃暗投明”，改宗易帜。释氏的这一手还真灵验，不少人果然改变了原来的信仰而皈依佛门，如拜火教的婆罗门姓迦叶的三兄弟，率领弟子一千多人投奔释氏。

第三，驳难论敌。在我国先秦，诸子百家为了反驳论敌，申扬己说，纷纷以寓言为武器进行斗争。尤其是道家，由于其社会影响比儒家要小得多，故而每每在寓言中树立两个形象——以道家人物为代表的正面形象和以儒家人物为代表的反面形象，以抨击儒家学说，申扬道家主张。“舐痔得车”（《庄子·列御寇》）痛斥了曹商积极用世的行为，抒发了庄子淡泊致远的人生哲学；“目击道存”（《庄子·田子方》）指责了鲁人的拘守成规，赞颂了温伯雪子的“自然”之心。释迦牟尼创立佛教的时候，各种学派林立，大致可分为严格遵守种姓制度的婆罗门教派和反婆罗门教派两大阵营。佛教属于反婆罗门教派，主张“四姓平等”。而在反婆罗门教派中，也是派中分派，观点歧异。因此，不仅婆罗门教派与反婆罗门教派两大阵营之间互相攻讦，口诛笔伐，就是在反婆罗门教派内部，各派系之间也彼此交锋，唇枪舌战。在形式上，佛经寓言往往把婆罗门和提婆达多（佛祖的堂弟和论敌）作为攻击的对象。

第四，训海劝戒。儒、道两家理论的落脚点，都意在教人怎样为人处世，因此是一种广义上的伦理学说。儒家理论的实践意义，就在于笃学善政、行仁布义、治国平天下，为此提出了一系列修身的规范和要求，并借助寓言广为传布。例如，“牛头马肉”（《晏子春秋》）通过禁止宫内女扮男装的故事，劝戒当政者以身作则，身体力行；“钓鰕鱼”（《孔丛子》）通过鰕鱼因贪吃诱饵而死的教训，

劝导世人不要贪恋俸禄，否则危在旦夕。反之，道家则站在儒家的对立面，提出了别具一格的伦理准则，鄙薄功名利禄，抛弃立德动机，提倡安贫乐道的品格，追求内在精神的充实。“不材之木”（《庄子·人间世》）劝导世人追求无所可用，无用终成大用；“杞人忧天”（《列子·天瑞》）告诫人们应当听任自然，不可庸人自扰。此外，道家还通过寓言塑造了一系列虽肢体残缺，却道德完美的“全德之人”，如《庄子·德充符》中的王骀、申徒嘉、哀骀它等，劝勉人们养形不如养神。

佛家主张用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种手段超度生死轮回之苦，达到正觉彼岸，往往通过寓言告诫弟子断慳去贪，修行持戒。“贪心入象肚”（《佛本生故事选·豺本生》）通过豺贪恋物欲的丑行，劝导人们淡于名利，以清心寡欲为旨归；“割肉贸鸽”（《杂譬喻经》）通过尸毗王舍身布施的义举，规劝人们舍己利人，以普度众生为己任。“伐毒掘根”（《出曜经》）、“色迷心窍”（《佛本生故事选·鱼本生》）、“四兽尊长”（《四兽因缘》）、“大意舀海”（《佛说大意经》）等寓言都对守五戒（不杀、不盗、不淫、不妄言、不饮酒）、伐三毒（贪、瞋、痴）进行了形象的描绘和通俗的解说。

（四）

在儒家、道家和佛家手里，既然寓言只是一种有效的手段和便利的工具，这就决定了寓言创作在题材上不拘一格、兼收并蓄的特点。大致说来，儒、道、佛三家寓言在取材方面不外以下几个来源：第一，民间故事。民间故事在三家寓言中是一种最常见的题材。在儒家，“束缊请火”（《韩诗外传》）、“掩耳盗钟”（《吕氏春秋》）等寓言故事首先流行于民间，然后才被儒家典籍反复引用。《庄子·逍遥游》中的“斥鴳笑鹏”这则寓言，作者便明确交待了出处：“《齐谐》者，志怪者也。《谐》之言曰：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搏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也。”这里所谓

《齐谐》，即是民间神怪故事的集子。《庄子·外物》中“任公垂钓”的寓言，作者也在故事结束后点明了来源：“已而，后世轻才讽说之徒，皆惊而相告也。”所谓“轻才讽说之徒”，便是民间故事的作者或传播者。

佛经寓言大量地取材于民间故事，更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据考查，《本生经》中的项王本生、大善见本生，就来自印度先王的传说，须大拏太子本生、睽仙人本生等，也来自民间传说；《六度集经》里的“国王本生”和《杂宝藏经》里的“十奢王缘”，故事情节合起来就是印度大史诗《罗摩衍那》的提要。至于佛经中的许多动物故事，更显然是本自民间的。在宗教的外衣下，佛经保存了大量民间故事，因而可以从某种意义上说，佛经是古印度民间文学的宝库。此外，在形式上，佛经寓言也吸取了民间艺术的精华，例如偈颂，本来是古印度民间说唱故事中一种常见的形式，佛家将其“移植”过来，增强了寓言的艺术魅力。

第二，历史故事。同民间故事一样，历史故事也是培育三家寓言的沃土。中国是个“信而好古”的民族，人们往往喜欢称引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老庄的言行来论证自己观点的正确。《庄子·寓言》开篇就有这样的话：“寓言十九，重言十七。”郭象注说：“寄之他人，则十言而九见信；世之所重，则十言而七见信。”陆德明《经典释文》说：“‘重言’，谓为人所重得之言也。”儒、道寓言之所以多以知名度很高、权威性很强的孔子、老子及有关史实作素材，就是因为他们是“世之所重”及“人所重者”，假借他们的名义，就能抬高自己的声望，增强寓言的表现力。《淮南子·道应训》一连引了52则历史故事，目的在于以征道家始祖老子之言——“以已验之事皆与昔之言道者相应也”，这些历史故事在此处则大多可看作寓言。

值得一提的是，儒、道、佛寓言中的历史人物各具特色：儒家奉行“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复古主义，寓言中的历史人物多是圣贤之人。道家大概与下层民众有更多的接触，因而寓言中的人

物除孔子和老、庄外，多是出身低微、职业低贱的普通人。佛家寓言采用历史题材，多以佛祖释迦牟尼一生的经历为主。这是因为，出于传教的需要，佛家把释迦牟尼的身世、经历和言行记录下来、传述下去，以作为佛教信徒行为的规范和楷模。佛经中的大量本生故事和佛传故事均属此列。

必须指出的是，历史故事作为历史事实，本身当然不是寓言，只有当引用者言在此而意在彼、赋予了浓厚的比喻色彩之后，它才转化为寓言。此外，有的寓言的主人公虽是历史人物，但故事情节却是虚构的，其用意完全只是利用“名人效用”罢了。例如《庄子·田子方》中“目击道存”的寓言，极力描写孔子对道家人物温伯雪子的赞颂和崇拜，就不可能是真实的历史事实。还有如“痾偻承蜩”等寓言中，孔子口吐道家真言，俨然成了深得道家精髓的“得道”者，显然不是真正的孔子形象。对于《庄子》的这种惯用手法，名儒崔述就看得十分清楚：“要其中皆寓言，不过欲明安命无为之意，故借孔子……而附会之，以自申其说耳。”（《洙泗考信录》）即使是以真实的历史故事作为寓言的题材，也往往经过了加工改造，并非对史书章句的完整抄录。寓言创作者往往只取一点史事或传闻垫底，根据寓意的需要来构筑细节。例如，《论语》中有“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话，《孟子·离娄》、《荀子·宥坐》便分别据以编造出“盈科而后进”与“君子见大水必观焉”的寓言；孔子曾有过陈、蔡绝粮之事，《庄子·山木》、《荀子·宥坐》、《吕氏春秋·慎人》等都据以扩展为主旨各异的寓言。

上述情况提醒我们，切不可把寓言误认为史实，文史混同，真假不分。事实上，以寓言之“假”乱史实之“真”者在历史上不是没有先例，唐代史学家刘知几曾指出：“自战国以下，词人属文，皆伪立客主，假相酬答。……而司马迁、习凿齿之徒，皆采为逸事，编诸史籍，疑误后学，不其甚乎？”就连博学多闻、去古未远的太史公在为孔子立传时，也曾把“孔子学琴于师襄子”等多则寓言以“实录”的形式载入《史记》，闹了个“贻笑大方”。至于某些“影

射”史学，出于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任意装扮历史，如根据《庄子·盗跖》中的故事，大讲奴隶起义英雄骂孔丘，则更是可卑可笑！

第三，神话传说。神话是人类最古老的思维创造，历来是文学艺术取之不尽的源头活水，道家和佛家的寓言创作也往往“回归”到神话母题。当然，这种“回归”不是原封不动地“拿来”，而是经过了创作者的理性滤化，被改造成了表达一定义理的文学样式——寓言。如《庄子》中“凿开混沌”的寓言，本源于《山海经·两次三经》：“天山有神鸟，其状如黄囊，赤如丹火，六足四翼，浑敦无面目，是识歌舞，实为帝江也。”作者在寓言中只保留了中央之帝的身份和“浑敦无面目”的原形，其他原有的神话气息通通被剔除了。《庄子》中的“斥鴳笑鹏”、“望洋兴叹”，《列子》中的“愚公移山”、“夸父追日”等，都是以神话为题材的著名寓言，但也都经过了一定程度的加工改造。

必须指出，儒家基本上没有以神话为题材的寓言。这大致是因为，儒家思想是一种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政治伦理学说，具有强烈的现实功利性，坚持“不语怪力乱神”，即“语常而不语怪，语德而不语力，语治而不语乱，语人而不语神”（朱熹注引谢氏说），极力排斥神话。鲁迅先生在论及我国古籍中神话甚少的原因时曾说：“一者华土之民，先居黄河流域，颇乏天惠，其生也勤，故重实际而黜玄想，不能更集古传以成大文。二者孔子出，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实用为教，不欲言鬼神，太古荒唐之说，俱为儒者所不道，故其后不特无所光大，而又有散亡。”（《中国小说史略》）因此，我们在儒家寓言中便很难见到以神话为题材的篇章了。即使偶尔涉及神话传说，其神异的灵光也早已丧失殆尽。如《孟子》中“逢蒙学射于羿”的寓言，虽是在神话传说的基础上加工而成，但逢蒙和羿已经失却其空灵、飘逸的品格，变成世俗人物了。

（五）

在创作手法和风格方面，儒家与道、佛两家大异其趣。这里先

说说道、佛寓言的主要创作手法。

第一，拟人。拟人就是将动植物乃至无生物赋予人的性格特征，是寓言创作中最常用的手法之一。《庄子》寓言娴熟地运用了拟人手法。“鸱吓鸛鵒”中的鸱（猫头鹰）代表社会上的心胸狭窄、贪恋名利之徒，“斥鴳笑鹏”中的斥鴳喻指现实中的平庸凡俗、鼠目寸光之辈。在“罔两问景”、“髑髅见梦”、“豕虱濡需”、“夔怜蚘、蚘怜蛇、蛇怜风”等寓言中，作者信手拈来，涉笔成趣，古代传说及现实中的动物、自然界的事物乃至人体器官，都成了有七情六欲、有思维活动和语言能力的“人物”。佛经中也有大量动物寓言，如“九色鹿”（《佛说九色鹿经》）讴歌了宽洪大度的慈悲之心，“二头鸟”（《佛本行集经》）谴责了势同水火的嫉妒心理，“野狗称王”（《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讽刺了欺世盗名的卑劣伎俩，“猴子捞月”（《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批评了庸人自扰的荒唐行径。此外，如“驴入牛群”（《佛说群牛譬经》）、“野狐饮水”（《法苑珠林》）、“猕猴戏潮”（《杂譬喻经》）、“鹿妇救夫”（《佛本行集经》）等寓言，都是通过拟人的手法，赋予动物以人格特征，来达到阐明教理、警世劝人的目的。

第二，夸饰。道、佛寓言善于运用夸饰的表现手法来渲染情节，烘托寓意。《庄子》中的多篇寓言都有离奇的夸张。夸大，则有“斥鴳笑鹏”——状写鹏的体积：“背若太山，翼若垂天之云”，描述鹏的气慨：“抟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缩小，则有“触蛮之争”——触国和蛮国竟盘踞在蜗牛的左右角上，且“争地而战，伏尸数万”。比之道家，佛家寓言中夸饰手法用得不是太多，然一旦为之，则有过之而无不及。例如，“广长舌相”（《大智度论》）描述释迦牟尼佛的舌头大而长，伸出来能覆盖面孔，直到发际；“大意沼海”（《佛说大意经》）描写大意与海神争斗，发誓沼干海水，终于感动上天，战胜海神。

必须指出，道、佛寓言在夸饰手法的运用上具有不同特点。道家寓言的夸张虽然“意出尘外，怪生笔端”，然而却还是局限于现

实世界，如“斥鴳笑鹏”寓言中大鹏“抟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是一个具体的高度；北溟与南溟也只是现实世界中相距最远的两极。而在佛家那里，数量单位是阿僧祇（无数），时间单位是刹那（瞬间）、劫（世界生灭一次，无量的时间）。佛家以这些在现实中不可思议的时空概念创造出幽冥的幻境，这是由其宗教旨意所决定的。佛家视现实为虚幻不实，认彼岸为王道乐土，于是通过夸饰的手法创造出另一个世界，而不是如道家那样，夸张只是一种修辞手段，是对现实世界某一方面的强调。

第三，玄想。寓言作为一种文学样式，其致思的途径是形象思维，故而多用想象的表现手法。道家尤其是《庄子》寓言情思飘逸，设喻巧妙，构思瑰玮，想象奇特，如宣颖所云：“喻后出喻，喻中说喻，不啻峡云屈起，海市幻生。”（《南华经解》）为了表达一种见解或抒发一种情感，《庄子》作者展开想象的翅膀创造了一系列光怪陆离的艺术形象：举凡达官显贵、能工巧匠，乃至天帝鬼神、龟蛇蛙鳖……，一个个色彩斑斓，栩栩如生。佛家寓言的玄想来得更宏阔，往往以“我念过去无数劫时……”、“乃往过去久远世时……”开篇，在此生之外虚构出前世和来世，在现实之外创造出地狱和天堂。

对玄想这一表现手法的运用，道、佛两家是在不同的理论背景和思维框架中进行的。要而言之，道家寓言中的玄想是一种立足于现实世界的艺术概括，而佛家寓言中的玄想则是一种宗教幻想，它把现实世界消融到想象之中，打破想象与现实、精神与物质的界限，现实反倒成了冥想世界的一个幻影，一个部分。

上述创作手法贯串着一种浪漫主义的艺术精神。浪漫主义“由于偏重理想，而昂扬着高出时代藩篱的头颅，以更充沛的热情和更丰富的想象，以幻想虚构的形式，以夸张的手法来塑造动人心魄的形象。”（张松如：《继承和发扬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传统》）无论是道家还是佛教徒，他们都有强烈的否定现实的倾向，要求摆脱现实条件的束缚，在幻想的世界里寻求精神的绝对自由，于是就有创作

手法上的拟人、夸饰、幻想……。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儒家寓言往往表现出一种现实主义的艺术精神和与之相应的创作手法。对于现实主义，高尔基指出：“对于人和人的生活环境作真实的、不加粉饰的描写的，谓之现实主义。”（高尔基：《谈谈我怎样学习写作》，见《论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坚持“不语怪力乱神”，因此不屑于进行“蛙鳖竞长，蜥蛇相怜，莺鸠笑而后言，鲋鱼忿以作色”之类的寓言创作，在儒家经典“四书五经”中，除《孟子》外，基本上找不到寓言。即使是《孟子》中的寓言，也往往取材于历史传说和民间故事，寓言中的人物都是历史上曾经有过（如子产、王良、赵简子）或现实生活中可能有的（如冯妇、齐人、楚大夫）。遍检《孟子》，也找不出一则动植物寓言。儒家寓言中虽然也有夸张、想象的成份，但总是那样平实、形象，没有跨出现实主义的门槛。例如《孟子》中塑造的孟子形象，虽也有不实之笔，但绝无怪诞之嫌，大体合乎实际，从而我们有可能将作为文学形象的孟子与作为历史人物的孟子大致等量齐观。

当然，我们对道、佛寓言和儒家寓言作这种区分，是就其基本的致思倾向来说的，不可在具体细节上作泾渭分明的划界。如前所述，先秦以后的儒家已非“纯儒”，而是吸收了道、佛思想养料的“杂儒”，因而我们能在柳宗元那里见到“贪心蛭蠹”“黔之驴”、在宋濂那里见到“蜀鸡”“白雁”等颇具浪漫主义色彩的动物寓言。而在道家 and 佛家那里，也不乏富有现实主义风格的优秀寓言。道家寓言中不少主人公如庖丁、尹氏等都是现实生活中的平民百姓，读来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倍感亲切。佛家寓言多取材于日常生活，身边琐事，信手拈来，具有强烈的现实感。即使是对佛陀的描述，在早期佛传中也还是现实的人，只是到了后来才逐渐被神化。

凡 例

- 一 本书按内容编排，分儒、道、佛三篇，每篇再分专题。
- 二 入选寓言的原则是：(1) 有思想特色和艺术特色，重在思想蕴含的丰富；(2) 有原始意义和现实意义，重在理论意旨的挖掘；(3) 有准确出处，每则寓言都从尽可能好的善本中选出；(4) 只选短篇寓言和寓言故事。出于体例的考虑，篇幅过长的寓言未收，寓言诗、寓言词赋、寓言戏曲等其他样式的寓言也未收。
- 三 每则寓言的内容及排列次序是：标题、原文、今译、赏析。标题大部分为自拟，或依寓言旨意，或取相关成语而成；原文尽量选择善本，并作必要的校勘；今译忠实于原作，力求文从字顺，辞意清楚；赏析文字主要阐述寓言的原始意义和现实意义，对寓言的历史影响、写作手法等也有所交待。